

傅佩荣



孔孟与现代人生

孔孟与现代人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孔孟与现代人生 / 傅佩荣著.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1.1
(傅佩荣文集)
ISBN 978-7-5640-3937-0

I . ①孔… II . ①傅… III . ①儒家—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 ①B22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32654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编 /	100081
电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68944990 (批销中心) 68911084 (读者服务部)
网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 /	7
字数 /	118千字
版次 /	2011年1月第1版
定 价 /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22.80 元
	责任校对 / 王丹
	责任印制 / 母长新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自序

随着东亚地区经济现代化的进展，儒家重新站到当代学者面前，接受品评与检验。大家都想辨认清楚儒家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思潮无疑是令人欣慰又令人担心的。不过，令人担心的成分日益加重了。万一两者之间毫不相干，甚至像《河殇》所谓的背道而驰，那么儒家可能从此遁入历史，成为我们思古幽情之寄托而已。

如果儒家与现代确有关系，无论这种关系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是构成了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我们照样必须面对一个更麻烦的后续问题：现代化目前所显示的无数后遗症，难道也是儒家所造成的吗？以较为温和的方式来说，儒家如果带领我们走上现代化，那么现在是否能够带领我们走出现代化的困境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儒家应该功成身退，不值得我们浪费时间再去读它；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如何”这两个字就会以巨型浮雕的姿态，逼得我们快快说出秘方。

没有现成的秘方。儒家是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其中的

永恒因素需要每一时代的人去重新发掘，重新诠释，以便使它展现新颖的活力。孔子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正是今日学者的工作指标。

凭什么认为儒家的永恒因素是我们的希望所系？这不是出自民族情感，而是接受一项事实，就是儒家早已在过去的世代里，内化于中国人的家庭生活、社会规范、政治结构，以及人生信念中，因此对中国人来说，两千多年与儒家共同生存的经验是不能抹杀，也不必抹杀的，眼前的问题是：如何在现代化的挑战下，继续与儒家共同生存，并且生存得有意义？

第一步是回归儒家的原始精神，就是要暂时抛开历代以来对儒家的不同诠释与具体应用，使现代人的心灵可以直接涵泳儒家的学说。这时我们不难发现：原来儒家以“人的存在”为焦点，延伸五方面的向度，深刻反省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超越界之间的关系这五种向度，这五种向度所会集成人之形象，既完整又周全，同时显示了开展的动力与安顿的条件。

第二步就要以现代人的观念与术语，配合实际的生活经验，清楚阐明儒家的旨趣。然后我们发现，儒家不是教条，甚至无一语是不合理性的。在这方面，笔者近年来，反复解说的“人性向善论”，已经渐渐获得共鸣，使许多朋友觉得儒家亲切可喜，同时彰显了人性内在的底蕴以

及奋斗上进的途径。

第三步则是具体的实践与应用。若是无法知行合一，再好的思想也只是空中楼阁。儒家对于个人自我在修身方面的期勉，自然是值得参酌奉行及细心体会的，但是问到儒家能否开出民主与法治，情况就相当复杂了。我的浅见是：民主与法治是人的存在所选择的合理方式，因此只要是正确洞识人的本性的学说，就不会背离这些方式。儒家正是这种学说，所以它与民主法治是相顺的。不仅如此，它还能济助民主法治之偏失。

以上三步的详细说明，构成了《孔孟与现代人生》一书的主题。全书各文体例未必一致，关怀则始终如一，要说明儒家如何使现代中国人存在，并且存在得有意义。

目录《《

自序.....	1
---------	---

第一辑 儒家与现代化

◎ 如何界说儒家	3
◎ 从现实到理想	6
◎ 新加坡之旅	9
◎ 开出与学习	12
◎ 向孔子学习	15
◎ 儒家与选美	18
◎ 如何好“礼”	21
◎ 儒家与宗教	23
◎ 台湾地区的宗教现象	25
◎ 儒家是一种宗教吗	28
◎ 高级宗教的特色	31
◎ 儒家的宗教功能	34
◎ 孔子与耶稣	37
◎ 信仰的分寸	40

◎ 儒家在哪里	43
◎ 儒家与现代化	45
◎ 儒家思想与东亚发展经验之反省	48

第二辑 现代思潮与儒家

◎ 与造物者游	57
◎ 人才教育	62
◎ 人格教育	64
◎ 人文教育	66
◎ 浅谈儒家的充实之美	68
◎ 儒家的人性向善论	80
◎ 立志学习	89
◎ 孔子的生活情调	91
◎ 学习的乐趣	94
◎ 谈交友之道	96
◎ 谈名声	98
◎ 现代思潮与儒家	101

第三辑 孔孟思想与现代人生

◎ 孔子的教育理想——讲于台湾师大教育学社	127
◎ 从《传习录》看阳明哲学	151
◎ 孔孟思想与现代人生	179
◎ 儒家能否解决现代人的困境	209

第一辑

儒家与现代化

如何界说儒家

两千多年以来，儒家早已形成一个复杂的现象，深深融入中国文化的每一部分，从器物、制度到理念，都可以清楚看到它的影响。于是，谈起儒家，不论褒贬，大家都很难找到支持自己的论据，各执一词，众说纷纭。

为了便于建立共识，得到有效的结论，我们可以在方法上注意两点：一是撇开器物与制度，扣紧理念来谈，因为器物可能毁灭，制度可能改变，唯有理念恒定不移；二是超越时间的局限，回归原始的儒家，如此可以暂时摆脱历代注疏见仁见智的看法。

那么，原始儒家的基本理念是什么？这个问题提供我们界说儒家的可靠线索，而其答案无疑环绕着“人”——人的潜能、人的现实与人的理想。

就人的潜能来说，儒家并不否定人有生物本能，如食与色，但是孔子与孟子绝未说过“食色性也”这种粗浅的论断；其次，人的认知与感受能力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人的特色另有所在，用荀子比较平实的话来说，是“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不过这种“有义”

并非生而有之，而是像“有知”是指“有能力去知”一样，指涉人之“有能力行义”。因为荀子还说过：“人之异于禽兽者，以其有辨。”这个“有辨”正是由知到义的关键；能够分辨是非善恶，由此产生道德要求，进而以行义来满全人性。笔者引用荀子的话来说明，是为了指出：儒家的孔、孟、荀对于人的潜能有一共同信念，就是“人性向善”；换言之，一般人以为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针锋相对，而事实上呢？这是他们对于“性”的规定不同所致。他们的真正歧见在于“天论”而不在于“人性论”，关于孟子，最清楚的一句话是个比喻；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既然“下”是水之“向”而非水之性，“善”也就是人之“向”而非人之性了。以此配合孟子以心之“四端”来解说“善”，视之为始源与萌芽，其义完全相符。正因为相信人性向善，所以孟子声称“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则肯定“涂之人可以为禹”。

但是，人的现实处境呢？人类社会的恶人恶事从来不曾绝迹，将来也不像是会消失，针对这个难题，人性本善论束手无策，人性向善论仍可自圆其说，人性只是“向”善，因此人还有自由为恶的可能；但是既说向善，则为恶时，就应该有自然的效应，此即“心不安”与“心不忍”。如果对于心的要求“旦旦而伐之”，就会形成麻木不仁的后果，成为孟子所批判的“非人”，非人不是死人；遇到重大刺激

时，如见亲人受难，或见自己将死，也会有自发的悲痛与悔恨，是即所谓“天良未泯”。从积极方面来说，儒家强调修行功夫，要不断地择善固执，积健为雄，因为人不但“可以”成为圣人，也“应该”成为圣人。

人的理想如果是成圣，大家难免疑惑：如何才是成圣？成了圣又如何？果真可能吗？何苦如此呢？结果儒家变成好高骛远的乌托邦。然而，像孔子所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种志向，难道不是自古以来人类的共同愿望吗？成圣难道不是每一个人内心最深切的呼声吗？

从现实到理想

如果我们接受儒家的信念，肯定人的潜能可以用“人性向善”来描述，那么人的现实与理想又该如何掌握呢？这个问题只有在辨明“什么是善”之后，才可能进一步加以讨论。

通常对于“什么是善”，有两种粗糙的看法。一是认为善是外在的、客观的，就是只要一个人的行为符合某些既定规范，从对父母的晨定昏省到对社会的急公好义，都可以视为好人好事的代表。这种看法的困难是，有些善行可能是伪装的，甚至成为沽名钓誉的手段，譬如，某些造桥修路的大善人竟是为害乡里的恶徒。另一种看法则主张善是内在的、主观的，就是只要一个人有心为善，那么他的行为效果即使造成各种灾难，也不失为一个善人。然而在“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情况下，谁能不觉得内疚呢？谁还能自视为义人呢？

以上两种看法可以分别称为效果论与动机论，显然各有所偏也各有所见。儒家的立场呢？中庸之道。善必须兼顾效果与动机，涵盖外在规范与内心要求。以孔子当时所

面临的处境来说，“礼坏乐崩”是指外在规范之瓦解，那么如何维系并且重建呢？只有通过对内心要求之强烈自觉，而内心要求即是“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就是明确的呼吁。不过，这里无须矫枉过正，以为孔子走入内心世界，成为纯粹的动机论者。因为孔子说自己“三十而立”，又说“立于礼”，足见内心要求与外在规范配合起来，“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才是儒家对于“善”的真正见解。

用浅近的话来说，“善”是两个或多数主体之间，适当关系之满全，这里隐含三点意思：其一，独自一人时，无善可言；善必须在人我相待的场合才能展现，“仁”字“从人从二”，确有深旨。试问：人无父母，如何尽孝？人无国家，如何尽忠？人无朋友，又如何讲信修睦？孝、悌、忠、信当然是善，但是独自一人流落荒岛时，如何满全这些要求？其二，人与人之间“在假设上”必有某种适当关系，因此，若不能生而知之，就要学而知之，甚至困而知之，同时，所谓“适当”，又随古今中外时空不同而稍异。若想行善，岂能单靠一厢情愿？这是儒家重视学习与教育的主要原因，亦即不仅为了谋生活，更为了安性命。其三，要求“满全”这种关系的动力，则无疑是与生俱来的。所谓“见父母自然知孝，见兄长自然知弟（同‘悌’）”，在一见之后就有要求满全的动力自然涌现。因此，善一方面摄礼归仁，另一

方面摄仁契礼，必待仁礼相应，既有内在基础，又有外在行动，然后可说“为善”。

现实生活只有一个指标，就是“择善固执”，不然难免荒废、遗忘或背离人性向善的根本要求。当然，人生还有一些非关道德的潜能可以体现，如知识与艺术，儒家对此亦充分肯定及发挥。但是，若试问什么是所有的人共同的立足点？则答案不是需要智慧与环境才能获得的知识，也不是需要敏感与才情才能品味的艺术，而是只要踏实地活在人间，尽其心安与人相处就可以成就道德上的善。这是人的现实呢？还是人的理想？儒家把现实与理想相含互摄的手法，令我心悦诚服。

新加坡之旅

曾经为期一周的新加坡儒学会议在1988年9月初结束，那时我的暑假也跟着接近尾声。留在脑海中的，除了新加坡令人耀眼的秩序与整洁，滨华酒店舒适的接待之外，就是大会中的点点滴滴了。新东亚哲学研究所主办这样一次会议，的确令人印象深刻。

来自五个地区的中国人，用中文讨论儒学问题，争辩之激烈是不难想象的。任何想为大会归纳几点共识的努力，注定是无法成功的。因此，我只能就自己的观察，提出一些感想。

首先，我不得不佩服劳思光与余英时两位先生在主题演讲中铺陈的两种观点：一是脱力论，二是游魂论。合而言之，中国自近代以来，传统文化早已陷于脱力状态，在面对西化与现代化的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儒家呢？在政治、教育、社会的解体过程中，沦为游魂，无所附丽。这两种看法既消极又悲观，有什么好佩服呢？

令人惊讶的是，三十八篇论文约有半数跳不出上述观点的笼罩。譬如，大陆学者谈到儒学的未来时，有两种分